

中共定海县工委领导下的 舟山敌后抗日斗争

□陈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条件。1937年10月,中共浙东临时特委(未久改为宁绍特委)成立。1938年10月,中共宁绍特派员竺杨来定海建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定海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中共定海县工委成立后,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发动群众全面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日寇、汉奸、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敦促并帮助当时政府 重新组织了战时政治工作队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根据《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在各县先后建立政治工作队,中共定海县工委派党员李隆华等参加政工队,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6月23日,定海沦陷后,定海县原政工队人员星散,组织不复存在。中共定海县工委根据宁绍特委的指示,通过在国民党县政府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郑建华,建议县长苏本善重建政工队,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活动。苏本善接受这一建议,在郑建华的帮助下,重建了政工队。重建后的政工队队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由郑建华任队长、王起任副队长,先在紫微、干礁一带活动,以后逐渐向长峙、吴榭、荷花、洞岙、北婢、茅西、大展(今展茅)、芦花、蒲岙(今勾山)、皋泄、甬东(今洋岙)、白泉等定海东区农村推进,在舟山广泛地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

政工队进入敌后,以东区各乡活动为主,以乡为单位建立政工小组,由钱铭岐、杨静娟、夏建奋、徐长海、胡尖峰等任组长,有的队员兼任乡事务员或文书,有的兼任小学教师。他们宣传、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篾竹工会、泥水工会,发动农民进行“二五减租”,组织职工开展提高工资待遇的斗争。同时他们还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武装小组,配合警察队进行锄奸斗争,或动员群众参加警察队。他们发动群众写慰问信、做军鞋、缴公粮,慰问前方将士和支援前线,他们还办夜校或识字班教群众读书识字并帮助群众进行农业劳动。在日寇的“清乡”扫荡中,政工

队长郑建华,政工队员杨静娟、胡尖峰、夏建奋等不幸被捕,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创建定海抗日武装

1939年6月23日,日军侵占定海城关和沈家门镇,国民党定海县政府未作任何抵抗就撤到大榭岛。中共定海县工委于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武装,领导舟山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不久党的舟山第一支抗日武装吴榭乡(今临城区域)抗日自卫队建立,由吴榭乡乡长梅燕翼担任队长,其弟党员梅馨和褚公良分别担任指导员和副队长。后来梅馨同志牺牲,吴榭乡抗日自卫队被国民党引诱编入抗日自卫团独立中队。由于国民党拉拢,自卫队逐渐脱离党的领导,使党对这支武装失去了掌握。

中共定海县工委吸取了吴榭乡抗日自卫队被国民党政府改编的教训,又以东区区署武装组的名义建立起一支武装,由党员李志祥任组长。随着人员的扩大,武装组改(扩)编为警察队(警察大队)。为了隐蔽斗争的需要,1942年下半年起,中共三东地委决定:东区警察大队改用“定象保安总队第一支队第五大队”番号。党先后派陈子方、朱洪山等担任大队副和指导员。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从开始的10多人、六七支枪,发展到1943年的300多人、200多支长短枪。武装活动的地区亦由东区发展到镇海江南、鄞东地区。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领导群众反“清乡”、反“扫荡”,多次攻打沈家门、大展等日伪据点,伏击下乡“扫荡”的日伪军,处死汉奸,破坏日军的通信和交通线,跟日伪军作战10余次,击毙、击伤和俘虏1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有力地保障了东区游

击根据地的建设。

1943年2月,党决定改定海县工委制为特派员制。10月,浙东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攻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定海县政府也企图消灭我党领导的第五大队这支抗日武装。为集中兵力粉碎国民党“围剿”浙东根据地的阴谋,中共浙东区党委和三东地区特派员决定把“五大”的主力武装和已公开的党的干部撤离舟山。10月5日,近200名指战员和干部在定海特派员钱铭岐的率领下,在北婢黄沙口分乘五艘大捕船,驶往浙东三北地区,奔赴四明山根据地,与浙东主力武装会合。随船还带去了2.5万多公斤粮食和其他物资,支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

创立定海东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2月,国民党定海县政府把定海本岛重新划分为两个区,任命吕道英为东区区长。在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吕道英同意我党派干部参加区署工作,共同抗日。中共定海县工委先后派楼童生、陈子方、王群怀等担任区署负责人,利用区署这块招牌领导定海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不久,定海县工委机关也从白泉后岙村迁到吴榭乡惠明桥,并始终坚持在那里,领导着东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经济上,东区区署设立了专门的税收机构,统一负责东区的税务工作。征得的粮税除保障武装人员和政工人员的生活、抚恤和救济群众外,每年还上缴浙东行署,支援浙东根据地建设。在组织上,为广泛动员和组织民众投入抗日斗争,定海县工委派政工队员协助各乡事务员在东区普遍建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教师十姐妹会等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减

租减息斗争。党组织还及时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输送到武装部队去,为部队输送新鲜血液。在文化教育方面,以提高群众的文化普及水平和民族自尊心为目的,东区各小学教学的课本统一由我党政工人员和小学教师自己编写,内容通俗易懂,以抗日为主题,激发群众的民族意识,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党还利用各校举办成人识字班、夜校等机会,进行抗日宣传。在军事上,县工委广泛组织民众抗日自卫武装。除活跃在东区的我党领导的“五大队”四个短枪分队外,长峙、蒲岙等乡还建立了抗日游击小组等核心组织,配合主力武装打击日伪军,保卫东区政权。

东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浙东创立最早的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四明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立前的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中,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宁绍地区一些公开活动的中共党员在当地难以立足时,就被转移到定海东区,一部分参加军政工作,一部分担任小学教师,达到了长期隐蔽、积蓄力量,最后又撤向四明山进行公开抗日的目的。

1943年10月,党领导的定海“五大”、县政工队员、东区工作人员在中共定海特派员钱铭岐等人的率领下奔赴四明山。此后,党在定海的活动又转入隐蔽状态。

1991年,中共定海区委党史部门和舟山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对中共定海县工委旧址进行了修整。此后,市、区及临城街道多次拨款整修旧址,扩充展览内容。1993年,中共定海县工委旧址被命名为定海区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命名为舟山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为配合浙江大学舟山校区建设,按原貌将其搬迁至校区区内。

作者单位:舟山市档案馆

保护民族工业火种 “电扇大王”叶友才抗战时期的西迁之路

□孙峰

定海商人叶友才,原名叶其棣,字友才。他是近代民族电器工业的先驱,建立华生电器制造厂,打破外资垄断,生产出中国第一台国产电扇。他积极开拓市场,联动南洋商会举办展销会,推动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地,稳坐“电扇大王”宝座。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叶友才冒险组织华生、华成机器设备内迁,搬迁规模居上海民营厂之前列。此举使民族电器工业在战火中得以存续,为后方生产提供支持,彰显“实业救国”的家国担当。

西迁 保护民族工业火种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炮火很快蔓延到上海淞沪一带。当时叶友才旗下的华生厂已与华南电器厂和亚浦耳灯泡厂合作组成华生电器厂股份公司,叶友才为董事长。淞沪会战爆发,公司有些股东就提出要将工厂迁至英法租界,意图借助租界力量,来维持生产。

叶友才力排众议,认为厂房所在地周家嘴路和南翔路一带均属战区,随着战事继续推进,租界也自身难保,前途叵测。而电机产业对于国计民生的作用不言而喻,如果落入敌手,则无疑使敌人有如虎添翼的可能,甚至危害民族抗战事业。叶友才毅然决定,将旗下华生、华成电器厂的各种机器、原料、成品全部迁往武昌,他说:“为保持实力计,供应国家、社会之需,把生死置于度外。”

在爱国民主人士、实业家胡厥文的影响下,叶友才参加了胡领导的“上海机器业联合公会”,并在政府号召下一起拆厂内迁。他们自愿将工厂拆运内迁,共赴国难,并协商修订了内迁条件,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内迁上海民营厂的提案。

1937年8月,他们就组建以机器五金制造业为主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公举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为正副主任委员,叶友才等当选为委员,组织和推动工厂

内迁工作。

在叶友才带领下,华生厂准备将职工200余人,设备和材料2000吨运往汉口,是内迁民营工厂中资金额最大的厂家之一。

受各种条件限制,当时他们只租到40艘木船,为防空袭,在船顶加上厚厚的草垫。但途经镇江附近时,还是遭到日机轰炸,5艘木船被炸沉,20人死亡,10余人受伤,损失惨重。到达汉口以后,叶友才租赁德商洋行仓库千余平方米,安装机床30余台,安排职工70余人,生产变压器及手摇或脚踏发电机、军用探照灯等,并兼修各种电机。华生厂生产的产品广受各界欢迎,并受到当地政府的嘉奖。而华成电器厂由叶友才的定海同乡周锦水主持迁至湖南衡阳,也成为当地产量最高、品种最多的电器厂。

不久,战火西延,武汉开始大撤退,叶友才处变不惊,立即组织大批船只运送物资,把工厂迁往重庆,在重庆市郊置地35亩,分5个车间恢复生产,成为当时大后方唯一能制造50马力发电机的工厂。

华生厂往重庆迁徙、恢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路坎坷,屡遭不测,可谓“伤痕累累”。据当时的华生厂企业档案显示:“始在重庆市区镇江寺街立厂,开始工作,而中途颇受挫折,当国货万县待运时,曾遭敌机轰炸,器材颇受损失,而长途迁移,所费亦不复货矣。在渝地市区立足甫稳,其时空袭转剧,为避免无谓牺牲,保持后方物资计,乃有迁乡之议,于二十八年秋在本市南岸猫背沱觅定地基,自建厂房,阅四月乃成,其时出品,除原有变压器手摇发电机等外,兼造各种兵工器材,如甲雷枪、榴弹、掷榴弹等。”在重庆,华生厂大力发展军用产品,支援抗日。其间,日军对重庆附近进行多次大规模轰炸,尤其是1940年8月两度遭敌机狂轰滥炸,华生厂各车间全部焚毁,损失比往镇江途中更为惨重。是年冬,叶友才开始在原地重建部分厂房,整修机器,继续生产,恢复经营。

叶友才参加上海工厂西迁活动,这对保存为数不多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精华,对

于持久抗战的贡献,以及给内地工业带来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这不仅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的高风亮节,也展现近现代企业家与国家民族共存亡的拳拳之心。

上海解放后,叶友才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发展生产。华生电器制造厂恢复制造交流发电机、电动机和变压器等,当时华生电扇仍畅销全国。正当国家实现了“三年经济恢复”的目标,华生厂准备迈向新的发展里程,1952年3月28日叶友才先生突发心脏病,在上海逝世,时年64岁。

上海 创立国产电扇品牌

叶友才“电扇大王”的创始,要从1916年算起。那年2月,叶友才与朋友一起筹集了7万元资金,于上海四川北路横浜桥选址设厂,名为“华生电器制造厂”,招收工人7人。取名“华生”,含“中华民族更生”之意。主要产品为华生电扇、电流限制表、电压表、电流表、开关等,同时兼营进口电器修理。后来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于1917年兼并了当时兆丰路(今高阳路)的元达电器厂。此时叶友才辞去洋行职务,专心经营华生厂。在他的精心打理下,华生厂的订单源源不断,规模再次扩大,叶友才又于“周家咀路购地30余亩,自建厂房,复向国外购置制造电机多件,而营业欣欣向荣,日臻发展。”

1919年,在上海总商会举办的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展览会上,华生厂生产的8kw直流发电机等五种产品获优等金质奖章。1924年,华生厂成批生产华生牌电扇,次年又开始生产56英寸吊扇。为了推销国货,开拓市场,叶友才通过上海华美电料行与香港华美电料行的关系,与南洋各地商会联系,举办电扇展销会,华生电扇走出国门。当时,华侨的热情支持也使这个民族品牌在海外大放光彩,这中间的原因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之外,更重要的是叶友才强烈的品牌意识、市场开发意识

和发展民族实业的爱国思想。

1934年叶友才将华生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此外,叶友才还投资乌镇电灯公司、十二圩电灯公司、南翔电灯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和国华电池厂等,兼任董事等职。

1936年,华生厂的发展到了一个个顶峰,电风扇产量突破了3万台,华生牌电风扇名闻海内外,成为国内权威产品,叶友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电扇大王”。

定海螺头 “电扇大王”叶友才的故乡

叶友才是定海人,也是个苦出身。

从定海古城往西,过晓峰岭、盐仓大河,翻过螺头岭,走过螺头王村,有一个叫“叶家岭”的地方,附近有村庄,称“下岙”,那便是叶友才的家乡。

下岙村里至今还有一座叶氏祖屋,下岙村人都叫“新屋”。其实祖屋还是老建筑,被称为“七角屋”,八根柱子,规模宏大,在农村一般很少见。祖屋的台门还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屋顶的瓦片、飞檐翘角等展现传统中式建筑风格,而台门旁类似罗马柱造型的装饰柱,是西方建筑常见元素。

据叶友才的亲戚叶安康老先生说:当年三兄弟。叶友才最小,分家时才十二岁,不会种田,只会放牛。但他读过私塾,喜欢看书,放牛时候,常带本书去骑在牛背上,他的房间里只有老式双门红色衣橱,里面有很多书。14岁时,叶友才去上海闯荡,发迹后,曾经回祖堂的老房子,带来很多书和杂志。其中有一本文学类杂志,如课本大小,直排。内有巴金写的一篇散文,叶安康记得清清楚楚。这本杂志是茅盾等创立的文学社的进步刊物,在上海出版。

创业有成的叶友才,曾经为家乡办过一所螺头小学。小学就办在下岙村与螺头王村之间的螺头庙里。这所小学属于义学性质,附近村子的儿童都可免费入读,这也算是叶友才回报家乡的义举。